

考古学中国化的践行者

——石兴邦先生考古之道探析

◆ 黄琬惠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 周学鹰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 石兴邦考古学研究具有多学科融合、本土化构建及方法论创新等多方面特点。粗略而言,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 坚持田野实践的中国考古学教育;2. 考古出土文化遗产的妥善保护与传承;3. 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立的探索与完善等。石兴邦学科交叉研究与本土化路径探索,对中国考古学体系发展完善影响重大,其研究范式对新时代考古教育、文化遗产保护及“新文科”建设等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石兴邦; 考古学; 学科交叉; 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Shi Xingbang is characterized by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localized development,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Broadly speaking,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re primari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1) advocating fieldwork-oriented education in Chinese archaeology; 2) ensuring proper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unearthed cultural heritage; and 3) exploring and ref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rchaeological discipline framework. Shi Xingbang'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localized approaches hav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s archaeological system. His research paradigms hold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contemporary archaeological education,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n the modern era.

Keywords: Shi Xingbang; archaeology;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localization

考古学属于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与文献历史学共同承担着研究人类历史的任务。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由于以研究人类的文化和社会为目的,故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①。

随着当代考古学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科介入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众多自然科学技术手段

及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等,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考古学研究各环节,使考古学交叉学科的特点愈加凸显,科技含量与人文属性不断提高。如今,考古学已成为综合运用各种科技手段和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多角度、多层面探讨古代人类社会发展并包含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交叉学科^②。

例如中国现代考古学重要奠基人之一的李济先生,便是如此。他曾先后于克拉克大学及哈佛大学修习心理学、社会学与人类学^③。归国后,投身中国考古学事业,提出“三点记载”“层叠”“探沟探坑”等田野考古科学工作方法,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基石。其所主持的殷墟等重大考古发掘项目亦对中国考古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除李济之外,夏鼐、梁思永、傅斯年、石兴邦等考古学家,都具有跨科学缘背景与研究领域。

1944年,石兴邦入学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边政系。此学科诞生于我国内忧外患之时,是一门符合国家发展建设急需的综合性学科,主要研究中国边疆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问题。“边政系属法学院,所以除民族学、民族志、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专业课外,还增设法律、政治、经济、行政管理、西洋史等课程”^④。因此,虽隶属于法学院,但社会学、人类学、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学习,为石兴邦日后从事考古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学基础和综合性思辨力。

1949年,石兴邦获法学学士学位后考入浙江大学,随我国著名生物统计学家、体质人类学家和统计学家吴定良先生攻读人类学研究生,期间研修了史前史、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统计学等几门主要课程,尤其喜好考古学^⑤。更因挚爱考古学,石兴邦转至夏鼐先生门下专习考古学。

尤其是夏鼐先生曾言,“我初入大学的一年是弄社会学的,后来转入历史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进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现在忽而改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⑥。作为石兴邦的研究生导师,对其影响不言而喻。

石兴邦的田野实践与学术理论形成了良好的增益效果,保持着动态平衡与相互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思维使石兴邦的考古学研究一直保持着不断创新的自觉和高度的人文关怀,不同时期的学术文章可见其学术理论不断深化与学术边界的持续拓展。例如《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具有民

族志研究特点,关注马家窑时期人们精神生活与信仰习俗;《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体现出他对图像及其演变的持续性思考,同时兼具神话史研究特点;《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辩证的发展过程及其源流的考察》除考古学科以外,还兼具设计学、美学等新兴学科的术语表达与思维呈现等。

据此,从边政学到人类学再到考古学,实践第一与多学科融合探索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成为他日后考古学方法论建构的重要知识储备与学养来源。这种成长经历也依然适用于今天考古学教育体系的人才培养。

一、基于田野的实践考古学教育

考古学是扎根大地的学问。对于考古学,若要真正发挥跨学科研究价值必然离不开田野考察与第一手发掘材料。初略梳理石兴邦的成长轨迹,可为佐证:

1950年,石兴邦加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多次参与和主持田野考察发掘工作。同年秋天,随考古所赴河南辉县开展琉璃阁相关发掘工作,这次发掘正式拉开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大幕^⑦,对考察战国三晋高级贵族葬制具有重要价值。

1952年起,他参与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中科院考古所联合举办的“全国考古培训班”第一期、第三期田野考古相关课程讲授与实习工作指导。

1953年,他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开展浞西、华阴等地调查发掘,期间发现半坡遗址。次年九月,正式开展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发掘的史前遗址,其发掘和研究在中国史前考古学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⑧。

1957年,石兴邦先生促成中国首座遗址博物馆——半坡博物馆成立,其前后共五次主持半坡遗址及墓葬发掘,并逐渐总结出一套遗址考古模式的基本框架。王仁湘对此评价道:“这个半坡考

古范式，并没有什么人用力倡行，却一直引领着中国田野考古的行进方向”^⑨。

在中国科学院期间，除西安半坡遗址发掘及关中地区考古调查等田野工作，石兴邦还参与了郭沫若主持编著的《中国史稿》第一卷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编写等；后又主持山西沁水下川和陕西临潼白家村两处重要遗址的发掘。

在陕西期间，他重点发掘了秦咸阳、凤翔、周原、陕北清涧等遗址，李家村、下孟村等原始文化遗存，促成了铜川耀州窑、汉阴、绥德等十余个工作站的建立。

1957年至1960年，石兴邦参与了长江流域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及清龙泉文化的部分考察及发掘，为后期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

1961年返回陕西，他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工作。

1976年，他重回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陆续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兼任第一研究室副主任。

1980年，石兴邦作为首批硕士生导师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生，培养了王仁湘、吴耀利、袁靖等后来在学界独当一面的考古学人。

1984年，他再次返乡任职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此间曾担任西北大学考古系名誉系主任^⑩。由此，石兴邦先生为陕西考古研究体系发展与完善做出诸多贡献，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研究人员。

扎实的田野考古实践滋养并深化了石兴邦多学科融合的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全景式聚落”这一重要概念的田野基础。

石兴邦的学术经历，边政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等学科背景对其考古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背景成为他打破中国考古发展初期部分理论窠臼的重要支撑，并促使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走出了跨学科、多维度的考古学范式探索之路。

多学科教育背景，使石兴邦考古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他不仅关注古代物质遗存发掘和分析，还深入探讨这些遗存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类行为模式。这种综合性研究方法下的诸多成果，对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成果更为文物保护、历史传承和文化交流等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

石兴邦多源的学科背景，在其考古学著作、文章及成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

《西安半坡》一书集中展示他主持西安半坡遗址发掘的成就。书中不仅详细描述半坡遗址物质遗存，还深入分析了这些遗存所反映的氏族部落文化聚落的社会组织、生产生活、经济形态、婚姻状况、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多方面^⑪。这种综合性分析法，正是其边政学与人类学学科背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人种与族系的形成和发展》《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纪念摩尔根逝世100周年》等文章中，石兴邦同样运用边政学与人类学理论视角，让考古学回到当时、当地的人文景观进行分析，对古代社会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解读。

《陕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一文，石兴邦对陕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他通过考古资料整理和分析，揭示了仰韶文化分布范围、文化特征、社会结构等。

这些理论研究成果的发表，不仅推动了相关考古学研究深入和发展，还为史前考古研究提供重要理论支持与方法论指导；不仅对中国本土学科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亦为后来者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借鉴。

因此，我们要深入学习并发扬石兴邦注重实践的考古学教育。学以致用，将所学的书本知识运用到田野发掘现场；也要将田野考古成果更负责、更高效地转化为学术新成果，以推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应拓展多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研究与合作，不断提升学术视野与思维阈值，为新时期的中国考古贡献自己的力量。

石兴邦在考古学研究中展现出多学科融合的显著特色,对于当下考古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具有借鉴价值。在人才培养方面,需注重跨学科知识体系构建。他在研究实践中整合历史学、地质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知识,当下考古学人才培养亦不应局限于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引导学生广泛涉猎其他学科领域,拓宽知识视野,培养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分析考古问题的能力。

从现代考古学科建设视角来看,多学科融合要求教育模式创新。课程设置应打破学科壁垒,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搭建更多元的理论与实践教育框架,让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体会不同学科方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同时,教学实践中构建多学科联合研究项目,通过实际操作,提升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技能,以适应现代考古学复杂研究需求,为考古学发展培育复合型人才。

二、考古发掘成果的妥善保护与传承

文物保护工作中,石兴邦提出辩证看待由于自然力破坏,对聚落与遗址的损坏;在具体文物保护中,根据生态问题不同,制定不同的保护方式等。例如:

半坡遗址保存下来成立博物馆凝聚了石兴邦的心血^⑧。这是我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⑨,在我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该博物馆不仅展出半坡遗址物质遗存,还通过多媒体等手段展示半坡氏族部落文化聚落的各方面。此博物馆的首先建立,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还提高公众对考古学的认识和兴趣,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交流和文化传播平台,推动了大众考古的发展和创新。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最终落成,是石兴邦重要考古遗址妥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先进性考古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石兴邦一生的研究成果和思想体系,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启示。早在法门寺地宫刚刚发掘之际,他就敏锐认识到法门寺文物发现,是陕西省旅游事业的有力增长点,对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保护,改善管理,搞好改革,充分发挥文物

的作用,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的方针,具有重大意义^⑩。

他强调:“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千方百计把已有的文物点址保存下来,越多越好,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时代,在历史正当性的存在下,它的经济冲力对文物(特别是地下的)具有一定的破坏性,我们应适应这个形式,加大保护力度,不要在事过残留的废墟上哀叹、凭吊,那就无法补救了!赵朴老在咏法门寺佛骨显世的长诗中,最后所叮嘱的‘后世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教诲,值得我们文物工作者长期记取警惕”^⑪。

石兴邦对半坡遗址发掘后回填的遗憾,深刻揭示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性,对当代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这一事件凸显了保护技术与理念的时代局限性——20世纪中期考古学界对遗址保存条件认知不足,未能预见回填对原始信息的不可逆损害。

其次,它警示后人需平衡学术研究与遗产存续,在发掘前应制定长期保护预案,避免短期研究行为破坏遗产本体。

再者,启示现代保护工作应强化多学科协作,如引入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等技术手段,实现发掘与保护同步推进。

此外,该案例也推动学界反思“利用”的内涵:文化遗产不应仅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更需通过合理展示如遗址博物馆、数字化呈现等以延续其社会价值,使保护成果惠及公众等。

这一遗憾最终促成中国考古学从“抢救性发掘”向“预防性保护”理念的转变,强调在保护优先前提下实现遗产的可持续利用。

三、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立的探索与完善

前已述及,边政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等多学科背景对石兴邦考古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多源学科教育背景加持,使石兴邦考古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与优势。

他不仅关注古代物质遗存的发掘和分析,还深入探讨这些遗存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与人类行为模式。这种综合性研究视域下的诸多成果,为我国文物保护、历史传承与文化交流等提供了有力学术支持,对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石兴邦对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探索、建立与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 互动性

石兴邦在考古研究过程中重视材料“互动性”分析与总结。他不仅强调人与人互动,也强调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由此产生了新石器文化体系三分说、细石器过渡说、信仰变迁说等。

对于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傅斯年、苏秉琦、夏鼐等考古学家各有看法,提出二分说、四分说、六分说等一系列学说。1980年,石兴邦发表《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文中比对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史前文化材料,提出“(新石器文化谱系)三分说”,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三大板块,每一板块再分成多个文化系统。他以生态文化学视角,从自然环境与经济变迁出发,分析新石器时期文化体系,划分出旧石器时代山林采集经济、中石器时代山麓过渡经济和新石器时代河谷农畜经济等三种环境与经济互动模式,构建起其“三分说”最基本的认识框架^⑥。

石兴邦不仅强调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也强调人与人互动关系及新旧群体互动关系。他指出:“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为模式的标准,是在不同民族部落和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不断频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⑦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互动与融合从未停歇,考古及历史研究需要以史料、文物为线索,却不能陷入缘木求鱼的窠臼。此认识高度,正是我们研究中要特别注意者。

(二) 连贯性

也许是早期边政系的系统学习深化了他对民族文化交叉性与变迁的理解,石兴邦研究同时关注人与环境互动关系中的“连贯性”。其研究不仅

注重地理环境上的连贯性,指出几个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区;同时还注重时间上的连贯性,以仰韶为坐标持续拓展着前后时期的研究纵深,注重考古新材料与原有研究比对、关联分析等,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学术结构与理论骨架。

《石兴邦口述考古》一书中有他关于专业与事业选择的思考:“选择进入考古这个行道,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在大学我学下的那些人类学知识,改做考古专业正好能用上。再一个原因,新中国的考古还是雏形,凭着自己的喜好,日后在这上边肯定可以有所建树”^⑧。

事实正是如此。石兴邦研究维度广阔,糅合着民族史、民族志及神话解读等多种视角,拓宽考古研究思维与路径。人文学科虽然细分领域繁杂,但深层次都离不开对人的关注与觉察,圈地自萌或画地为牢均不可取。

(三) 人文性

石兴邦研究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with 人类在自然环境中不断发展的认识与自我意识,也深刻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规律性。

他注重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螺旋式上升,强调“从考古研究的角度来说,对实物资料的揣摩,丰富的感性认识对事物的理解更为重要”^⑨。其彩陶纹样研究,生动体现了理性与感性并存的研究特质及其强大的联想共情能力。《石兴邦考古论文集》收录有与此议题相关的四篇论文。关于彩陶纹样变迁,他总结出图形演变规律:简单图形先经历不断复杂化过程,最终又回归大道至简。“唯有作为附饰用的波折纹,生命力很强,也是由最不具特殊观念形态的表征物而延续到最后”^⑩。

石兴邦对彩陶纹样研究中,可见早年书法学习对其艺术领悟力的深刻影响^⑪。文中诸多表述可见他后期在设计学、美学等领域中同样汲取了大量知识以完善其考古学研究体系。例如,“彩陶纹饰与器物形制是艺术美的复合统一,二者关系十分密切,它是绘画与造型完善的统一体。花纹与器形是相伴相随的,犹如衣之与体,是形影相应

的完整体”“彩陶纹饰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有着一定的社会功能”^②等。这些表述熟稔运用诸多艺术学与美学术语和概念,让考古分析不仅突破相对较单一的器型概述,亦不囿于对装饰美感的简析,更进一步将美与功用相联系,已然涉及设计学的范畴。

上述论文发表时间不难看出,石先生对于彩陶纹样研究持久关注、思考与分析。考古研究较难一蹴而就,更多时候是将自己零星的知识和材料逐渐整理成一个“横剖面”,再通过自己的研究与积累将它连成一个“纵切面”,有的时候,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常会止步于此。

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保留信息节点,更要融会贯通,将已有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自己关于某些零星知识的完整序列,不断补齐知识漏洞;并在知识序列中发现新问题,启发新研究。如此,或能够突破纵横剖面的单薄叙事,真正形成茁壮有力的柱状学术系统。

(四) 本土化

石兴邦运用交叉学科研究法,为构建我国多元的史前考古文化体系贡献了独特价值。他的研究始终具备显著的中国特色,并不断探索中华民族文化根脉。基于我国具体情况,石兴邦认为: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使命,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调查、发掘、研究物质文化遗存,以复原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特别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和记载简略的古代社会历史,以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③。譬如:

他积极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融入考古研究,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④,强调从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分化等角度解读考古材料。例如,他通过对半坡遗址中墓葬、房屋布局的分析,探讨仰韶文化时期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指出“半坡时代是氏族制下的家族集体所有制时代,每个家族分若干个小家庭,生产和分配是在家族内进行的。小家庭生产和分配的行为与劳动产品的享用,应是受家族的制约而决定的。家族内的共同劳动与平均

分配,是氏族共产制的体现”^⑤,为中国考古学提供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框架。这种结合既符合当时的学术潮流,也推动了考古学服务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本土化目标。

在考古类型学应用上,石兴邦不拘泥于西方“器物排队法”,而是结合中国古代文化特点,倡导更贴合本土实际的分类标准。他主张将器物联系所处具体文化与社会生活去理解,注重器物功能、纹饰与文化内涵的关联,通过对陶器、石器 etc 遗物的细致排比,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分期体系。提出标型学应与地层学研究相结合,并强调器物的组合关系^⑥。这种方法论的本土化创新,使中国考古学能够更准确地揭示本土文化的发展脉络。

石兴邦长期致力于考古教育,培养了大批本土考古人才。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通过田野发掘实习,让学生深入理解中国考古的本土特色。他强调人才的重要性,提出首先必须抓人才培养,其次才是对一些考古问题更高层次的思考和认识;除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石兴邦还提倡关心没有能力读研究生的更多年轻人,为他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条件提供更多的方便^⑦。他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深刻影响几代中国考古学家,为中国考古学本土化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石兴邦的考古实践始终围绕“中国化”这一核心。诸如《论“炎黄文化研究”及有关问题》《黄帝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等文章都反映他对于中华本土文化溯源问题的持续关注。他提出,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指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体现多民族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特色和反映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物质文化体系^⑧。通过发掘本土遗址、创新研究方法、融合理论与实践,推动中国考古学从早期的模仿西方走向具有独立学术品格的本土学科。尤其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确立“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及中国古典文明起源是多元而非一元的;是土著而非外来的,是突出影响融汇而非孤立的崛起发展”^⑨的发展逻辑。

他的工作不仅丰富中国考古学内涵,也为世界考古学提供了具有东方特色的研究范式。

知所从来,方知所去。考古学是务实的学科,研究材料与内容都以客观事实为对象。中国经济持续繁荣,国际局势角力却难以止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业持续发展当然重要,而充实国民精神、提升民众底气的人文产业发展也应同步。其中,“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与未来价值。

四、结语

概括而言,石兴邦先生的成长及其学术一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坚持实践多学科融合的中国考古学教育。2.考古出土文化遗产的妥善保护与传承。3.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立的探索与完善等。

时代变迁,与石兴邦等老一辈中国考古学人相比,如今的中国考古有着更多学科参与。科技手段不断提升,跨学科人才持续涌入,尤其是党与政府各级部门高度重视等,为考古学科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环境与条件。

1993年,石兴邦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一文中就强调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把丰富的考古实践中的成功实验上升到理论上进行概括和研究,使其理论和方法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以便于建设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体系”^⑩。2021年,恰逢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明确提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殷殷期许。

石兴邦的学术生涯伴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一起成长。作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的研究不仅强调人与环境互动的重要性,且坚持以中国本土文化为核心,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体系,推动了现代考古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发

展。石兴邦交叉学科理论基础,丰富了我国考古学研究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科学方法与视角。

考古学是诚实的学科,有着朴实与厚重的文化底色。石兴邦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这份事业。他真正践行了自己的誓言:“必死的人,要做不朽的事业!”

注 释:

① 王巍:《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

② 考古学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2024年2月16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③ 王晓庆:《论李济科学考古思想的建构》,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④ 石兴邦:《石兴邦考古论文集》前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⑤ 陆航、石兴邦:《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开创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6日。DOI:10.28131/n.cnki.ncshk.2022.001339。

⑥ 何文竞:《考古学家懵懂时》,《大众考古》2024年第4期。

⑦ 郭强:《新中国考古从这里起步 辉县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意义》,《大众考古》2020年第11期。

⑧ 贺卫良:《石兴邦与半坡遗址》,《大众考古》2021年第11期。

⑨ 王仁湘:《用一柄手铲解读史前中国——读〈石兴邦考古论文集〉》,《文物》2015年第12期。

⑩ 石兴邦:《中国当代考古学家》,《新西部(下半月)》2008年第6期。

⑪ 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⑫ 国家文物局编:《回忆王冶秋》,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508页。

⑬ 杨清编著:《远古龙人》,蓝天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⑭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法门寺博物馆等编:《法门寺地宫珍宝》前言,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页。

⑮ 石兴邦:《保“根”重“源”——现在我们应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石兴邦:《石兴邦考古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24页。

(下转第65页)

银两，亦经清交养心殿造办处兑收完讫。至娇黄次色，自应遵旨恭缴。查自乾隆柒年分至乾隆拾肆年，次色典器总共壹万壹仟柒拾玖件，理合分年开造清册照例交送广储司按册查收。再查乾隆拾叁年分奉文烧造各种祭器，除将上色交收外，所有各种次色祭器壹百陆拾肆件，谨汇同黄器恭缴，合并陈明，谨奏。乾隆贰拾壹年柒月初柒日。”前揭《唐英集》，第1200页。

⑥ Jia Yu Hou, The origins of imperial yellow glazed porcelain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 to 1,644) China: Technical comparison to low-fired tile with yellow glaze, Archaeometry, 2021, pp.1-12.

⑦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吉简吉美：吉州窑遗址出土瓷器集萃》，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130~137页。

⑧ 首都博物馆：《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官窑瓷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92页。

⑨ 前揭《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官窑瓷器》，第93页。

⑩ 御窑遗址出土永乐时期标本中属于试烧品的有釉里红点彩碗、内满红釉外釉里红龙纹碗等，参见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编：《明代洪武永乐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108、109、308、309页。

⑪ 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资料待公布。另，大英博物馆收藏有永乐黄釉瓷盘。

⑫ 2024年御窑遗址西门内南侧考古发掘出土资料，待发表。

⑬ 永乐绿彩灵芝竹叶纹器托，1994年出土。见前揭《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官窑瓷器》，第98页。

⑭ （明）谢雍编、禹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钧州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02、103、120、218页。

⑮ 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136页。

⑯ 南京博物院：《南京聚宝山琉璃窑》，《文物》1960年第2期。

⑰ 故宫发掘的庞湾武当山琉璃窑，资料待发表。

⑱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北京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⑲ 刘勇伟：《四川彭州明崇宁王墓的发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4年第11期。

⑳ 成都蜀王府琉璃窑生产绿釉日用器物，和酱褐釉、绿釉、黄釉的俑、各种琉璃建材。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成都琉璃窑厂：2018—2019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330页，彩版八一至彩版八六。

㉑ 王光尧：《从外来方物到神权与王权皇权的象征——在技术传播视野下探析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琉璃建材》，《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5期。

㉒ 前揭《明代宫廷陶瓷史》，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329页。

（责任编辑：赵 蕾）

（上接第59页）

① 王仁湘：《用一柄手铲解读史前中国——读〈石兴邦考古论文集〉》，《文物》2015年第12期。

② 石兴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石兴邦：《石兴邦考古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9页。

③ 关中牛：《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④ 石兴邦：《中国民族社会考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与方法问题》，《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⑤ 石兴邦：《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辩证的发展过程及其源流的考察》，石兴邦：《石兴邦考古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5~157页。

⑥ 关中牛：《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1页。

⑦ 石兴邦：《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辩证的发展过程及其源流的考察》，石兴邦：《石兴邦考古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5~157页。

⑧ 石兴邦：《中国民族社会考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与方法问题》，《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⑨ 石兴邦：《马克思主义与史前史的研究——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

⑩ 石兴邦：《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和形成史的考古学探讨》，石兴邦：《石兴邦考古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5页。

⑪ 石兴邦、周星：《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及其史科学与方法论——为纪念尹达同志诞辰八十周年而作》，《史前研究》1986年第21期。

⑫ 石兴邦：《石兴邦考古论文集》前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

⑬ 石兴邦：《中国民族社会考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与方法问题》，《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⑭ 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石兴邦：《石兴邦考古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9页。

⑮ 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石兴邦：《石兴邦考古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79页。

（责任编辑：赵 蕾）